

吐蕃簡牘綜錄

王尧 陈踐



吐蕃簡牘綜錄

王 尧 陈 践 編著

文 物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编辑：范 纬

避暑山庄综录
王 尧 陈 践 编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1 插页：4

统一书号：11068·1432 定价：5.90元

目 录

一 凡例.....	(1)
二 新疆吐蕃简牍考述及释例.....	(3)
三 图版目录.....	(13)
四 图版.....	(15)
五 吐蕃简牍综录本文.....	(23)
(一) 汉文译文及考释.....	(23)
一经济：土地、粮食、赋税	
二军事	
三氏族、部落、地名	
四文书	
五宗教	
六其它	
(二) 原文摹写 (附拉丁转写)	
六 后记	

凡 例

- 1 本书所收录吐蕃简牍共464支。收入本书时，统一编号，1—464。译文编号与此全同。其中，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发掘所得者，78支，以RMF代号表示，RMF之前数码表示发掘年代，其后之数码表示编号。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所得，收藏在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及大英博物馆者，共380支，均按原编号过录。其编号之前“Ⅱ”表示参见托玛斯（F.W.Thomas）的著作《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集》第二册，Ⅱ之后的号码即该书之页码。另、俄人劫去者6支，附于最末。编号为459—464。无代号。
- 2 本书汉译及考释中引用的藏文均转写成国际通用的拉丁化符号，以利印刷。同时，在原文摹写之下，附以拉丁转写，便于检读。转写规则如下：

Ka Kha ga nga
Ca Cha ja nya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tsa tsha dza wa
zha za va ya
ra la sha sa
ha a
i, o, u, e, o g·yṅgy

- 3 A、B表示木简的两面。A、B之后的数码表示行次，如A1表示该简第一面的第一行。
B2表示该简第二面的第二行。
- 4 摹写的原文之下，附有若干藏文释词，供阅读时参考。
- 5 本书简牍分类及编号如下：

(1)经济	1—105
(2)军事	106—171
(3)种族、部落及地域	172—320
(4)文书	321—417
(5)宗教	418—442
(6)其他	443—464

新疆吐蕃简牍考述及释例

一 概 述

传世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包括三大类：一是金石铭刻，藏语称之为Rdo-ring-dang-dril-buvi-dkav-gtsigs；二是写本手卷，藏语称之为Shog-dril-yig-rigs；三是竹木简牍，藏语称之为Khram，或称byang-bu。

按传统的说法，藏文是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的文臣通米桑布札（Thon-mi-sambhodra）奉诏创制的^①但至今尚未发现当时的文献材料做为凭证。上述的三种材料虽然在时间上都晚于七世纪，有的是八世纪的，有的是九世纪，也有的可能是十世纪的遗物。但毕竟还是早期的文献，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事实上，由于这些文献的问世，研究这类文献成果的不断出现^②，大大地弥补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文献不足的缺陷^③，从而使人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氏族婚姻、民间习俗等方面的面貌。如今，许多藏学研究者兴致勃勃地在探索当时的典章制度、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等课题。不少中亚学学者、敦煌学学者对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④。

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年）和罗常培（1899—1958年）两位先辈的重要著作《吐蕃赞普名号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⑤《唐五代西北方音》^⑥是近代藏学研究中的里程碑。我们遵循于道泉教授和马学良教授在1951年建立藏语专业时制订的方法：从语言入手，掌握现代藏语的某一方言，进而探索其他方言，把方言中的若干语言歧异当作历史现象来观察，继而深入阅读、研讨古代藏文文献。我们有幸能多次深入藏区，探幽抉微，逐渐地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藏学研究与教学体系，其中就有“吐蕃文献学”的专题课程和著述^⑦。

我们所编辑的《吐蕃简牍综录》一书，辑录了至今出土的绝大部分吐蕃简牍，共464支。这些简牍大部分出于新疆南部罗布泊（lop-nor）南岸的米兰（myi-rang）故城遗址，今属塔里木（nob-chung）县辖。另一小部分出自于阗以北的万顷流沙当中的慕士塔克（mozthag）地区。

英国的A·斯坦因在1907年新疆探险考察活动中所获藏文简牍398支。影录于《西域》（1921年）（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 Most China, PP.1475-1502)和《亚洲腹地》(1928年)(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PP.1011-1117)两书之中。又,此书近有印度 Cosmo Publications 的复印本,1981年新德里出版,简牍影录载于第四卷。

1914年6月5日俄国的马洛夫(S. E. Malov)从新疆获得若干吐蕃木牍,由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撰写了《马洛夫收藏的藏文本牍》(《东方学研究所学报》)和《罗布泊地区的藏文本牍》(《东方碑铭学》1953年)两文共公布了6支藏文本牍。

我们在1979年夏季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之邀,到乌鲁木齐市亲自验看他们从1959年*、1973年、1974年几次考古中所得的全部藏文简牍。除逐件摹写过录之外,拍摄了全部照片。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吐蕃简牍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关于出土这些简牍的地点,穆舜英同志作为考古队的领导人,亲自参与了田野工作,她有一段详尽的描写:

“1973年,在新疆婁羌米兰地区曾发掘了一座唐代吐蕃的古戍堡遗址,为研究吐蕃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批重要材料。

米兰吐蕃古戍堡,南临古米兰河道,正当从甘肃敦煌通昆仑山北麓的要道,此古堡为一南北宽约56米,东西长约70米的呈不规则正方形的戍堡。戍堡四角有望楼,堡城墙

* 关于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婁羌、米兰故城所得的藏文简牍,1960年8、9期《文物》杂志上曾有报导,内容转引如下:

“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组织一个工作组在库尔勒专区各县进行文物普查,曾到婁羌县米兰古城清理残房屋内的一些文物。

米兰古城位于婁羌县城东北约75公里,青新公路从古城中心穿过,在城中部还保存着一条从南往北已干涸的河床。城内遍布夹砂红陶片与灰陶片。……碉堡、佛教寺基等都是用土块建筑的。碉堡高约20米,底部径约10米左右。

第三号房子,长370、宽290、深140厘米,出土文物14件,有古民族文字木简4支,长15.6、径1.3厘米。

第四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21支,……木简大小两种,一长10.6、宽1.6厘米;一长14.4、宽2.3厘米,一端有小孔一个。

第五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14支,木简长19.9、宽3厘米,简的一端有一小孔。

第六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59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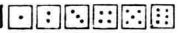
第七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残纸片与木牍95件。

第八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与纸片13件。

第九号房子,有古民族文字木简19支及纸片……。

按:以上共获简牍225支。文内所谓“古民族文字”皆为藏文。

为土筑，下层是夯土，夯土层中夹有红柳枝，夯土层上砌土坯，墙似曾几度改建增补。堡西墙有两段宽达五、六米的缺口，可能即是堡门所在。堡中间低凹，北部为一阶梯形的大土坡，自低凹处至堡北墙依土坡形盖砌小屋，房屋下部有的挖成穴状，半入地下，上部砌以土坯，有的全部为土坯砌成，不见门洞。屋为平顶，依地势高低成阶梯形，其构造颇类今拉萨的布达拉宫。《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屋皆平上，高至数丈’，正是这种建筑的特点。堡东部为一大型房屋，深达五米，有建筑规整的墙，似为堡中官府所在之地。其南面为一高达十二米的土台，土台上立有木杆，可能是举烽燧的设置。在堡的北部房屋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吐蕃文木简和文书。

遗址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卜骨，从出土卜骨看，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洞直径约1厘米，成规则排列，其中有一块卜骨上还记载有吐蕃文字，可能是卜辞纪录。出土文物中还有一颗木质白骰子，是一个1.3厘米见方的小木块用墨点标明形式和现在使用的骰子全同……”^⑧。

从这一批简牍来看，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简牍右端有一木槽，可以捆扎加盖封泥，说明当时是用于驿送的公文。

其二：简牍往往是有削刮的痕迹，似乎是一次一次加以利用。每刮削一次，在边沿上刻上一个记号。

其三：在右端常有一洞，可以用绳子穿联在一起，即所谓“韦编”。

其四：简牍文字古拙有许多不同正字法的俗写和缩写字。似出于下级军官和吏员之手，颇有古朴的情趣。

另外，在1980年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本中也有很多关于木牍文书的记载^⑨兹录几条于后：

“及至狗年（唐上元元年，674年），赞普夏驻于悉立，回至交拉；冬，至仑邦那，于拉克之布穷集会议盟。点验红册。”

“及至虎年（天授元年，690年）立大藏之红册，噶尔·没陵赞藏颊与巴梦·野赞通保二人征收腰茹之地亩税赋。”

“及至兔年（天授二年，691年）清理土地赋税并统计绝户数字，……依红册征集兵丁。”

“及至龙年（天授三年，692年）立红册木牍……”

“及至虎年（长安二年，702年）颁发录于木牍上之诏令。”

“及至羊年（神龙三年，707年）‘岸’之宫廷直属户籍移之于木牍。”

“及至猴年（景龙二年，708年）统计查对禁军之红册木牍。”

“及至鸡年（景龙三年，709年）统计，清查‘茹拉’红册木牍”。

从这几条录文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简牍在吐蕃时期应用的范围和作用。

二 考 索

由于这一批简牍和写卷出土于新疆，对人们研究探讨当时吐蕃人在西域活动的情况就更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了解当年吐蕃军旅在西域疆场上的驰骋；安西四镇的争夺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的风云激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批藏文文献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史料，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去探讨。

在这里，为了弄清楚简牍其所以产生于新疆地区的原因，必须先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新唐书·吐蕃传》明确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人残羈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资治通鉴》把此事系于高宗咸亨元年夏四月，说：“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

这一说又见于《新唐书》的龟兹传、于阗传、疏勒传。更见于小勃律传中记载：“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使人相信在公元670年吐蕃正式占有西域四镇。但，事情似乎来得突然，何以吐蕃人马一下子来到西域而且能入残一十八州，而淹有四镇？这个疑问，在《资治通鉴》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十二月条下，得到解决，“颉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后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看来，在公元662年吐蕃的军事力量已经在西域相当活跃，能左右十姓的部众了。再看同书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三月条下所记：“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大概是没有救得下来，接着，就发生了670年的吐蕃占有整个安西四镇的情况。在藏文文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大事纪年”第二十一条记载着：“及至马年（咸亨元年，670年）赞普车驾驻于倭塘，于且末国^①击唐军多人，是为一年。”说的还是咸亨元年入残十八州事。“大事纪年”的第二十七条：“及至鼠年（仪凤元年，676年）……论赞聂领兵赴突厥；东布（即赞聂）举行军事会议。”“大事纪年”的三十条记载：“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四十条记载：“大论钦陵自突厥引兵还。”第五十条：“猪年（699年）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五十一条：“鼠年（700年）遣送东叶护可汗往突厥。”第七十一条：“猴年（720年）默啜可汗之使者前来致礼。”第八十条：“蛇年（729年）大论穷桑于畿萧玛苑集

会议盟，征集，增加预备军旅之数字，引兵赴突厥地，还。”第八十三条：“猴年（732年）大食与突骑施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第八十五条更有新的发展：“狗年（734年）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可以说，吐蕃在西域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他与西域豪酋之间的关系由军事争夺发展到政治结盟，而婚姻结合又为这种联盟提供了保证。

（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陈子昂上书陈事说：“……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公元692年，形势又有一变，唐廷派了熟谙边情的将领王孝杰经营西域，一度从吐蕃手中夺回四镇。《资治通鉴》在长寿元年（692年）冬十月条下记着：“……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这一次唐廷军事行动的胜利，似乎是局限于交通线和军事府镇据点上。吐蕃军旅并未完全离开西域，相反，与各部落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加强了。从藏文文献中透露的消息来看，吐蕃一直对西域派有驻军；大论一级的军事首长经常去西域一线巡视。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河陇以西之地尽失，只有若干孤城在吐蕃包围之下苦战苦撑。建中二年（781年）以后，河陇、西域一带都是吐蕃的势力范围，能与他抗争的只有回纥。对于唐廷来说，只能是“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⑪，而“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⑫“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闚近郊。……”^⑬

直到大中五年（851年），张义潮组织的各民族联合的起义军乘吐蕃王廷内部纷争扰攘无暇东顾之机，举事兴兵，恢复了唐廷在瓜、沙、伊、肃的统治。《册府元龟》卷二〇，把这件事列入帝王部，功业二，记载着：“吐蕃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

由于吐蕃本土政局不稳，影响到派驻在西域的军队，咸通七年（866年），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导致吐蕃最终撤出西域。回纥与吐蕃在西域的势力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册府元龟》把这件事作为助国讨伐的一例，记载于卷九三七，外臣部。“咸通七年，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

简单地小结一下：自龙朔二年（662年）到长寿元年（692年）的三十年间，吐蕃第一次占有西域的安西四镇；长寿二年（693年）至咸通七年（866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之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手中，只有回鹘成为对峙、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唐代中期我国几个兄弟民族之间在西域的复杂关系。

因为吐蕃的势力在西域长达一百多年，所以，吐蕃简牍在新疆出土是毫不奇怪的事。

三 释例

(一) 73RMF 12 : 1

- 正面 1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 背面 1 2

(译文)：交付哲蔑悉腊衣著：汉地织成披风一件，白山羊皮披风一件，羚羊皮短披肩两件，锦缎裘袍一件，羚羊皮上衣一件。美哲缎裙一条，新旧头巾两块，丝带五条等……

(二) 73RMF 26 : 18 此号影印件上A、B上下倒置。

- 正面 1 2 3
- 背面 1 2 3

(译文)：付与开那(借)麦一克五升，拉贡鲁祖麦五升、青稞五升，尚穷麦一克，古穷(借)青稞三升、麦五升，用三份俸田合王田一突。付岸(本)悉斯禄唵经费麦一克半，依主母之命，后，悉斯之子借麦一克半，孔息兄弟(借)麦两克半。

(三) 73RWF26 : 18

- 正面 1 2 3
- 背面 1 2 3

(译文)：上峰令毕尔迈公将驮畜驮运粮食，赶驮人噶西玛无意前往，其骆驼、驮畜交与(毕尔迈公)运送粮食。嬉羌辖境全部骆驼、驮畜均由迈公驱赶，噶西玛无意前往，上峰决定予以严惩。尼毕悉斯彭等人借口寻事，谓要将骆驼、驮畜抢回，此事要回报上峰，骆驼与财物。……

(四) 73RWF19 : 9

- 正面 1 ལྷོ་ཞིང་དྲོ་གཅིག །བམ་བྱ་ཇི་ཞིང་དྲོ་གཅིག
2 ཅུ་པ་ལི་ཞིང་དྲོ་བྱེ་དང་གཉིས། །གསས་བཅན
- 背面 1 གིས་དཀར་རྩ་ཚོས་པ། མཐོང་ཁྲུབ་སློངས་ནས
2 དྲོ་གཉིས། ཞིང་ལག་དྲོ་གཅིག །

(译文)：……之农田一突，莽布支小王农田一突，资悉波农田一突又半，悉斯赞新息荒地在通颊者两突，零星散地一突。

注释

①关于通米桑布札奉松赞干布的诏命创制藏文的说法最早见于若干疑经(或称掘藏、伏藏，往往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如：

《松赞干布遗训集》(mani-bkav-vbum)：“在通村庐日卡地方，有通米阿努惹达之子，名通米桑布札者，少年聪俊，乃派往天竺，携带黄金一升，习学梵天文字，返藏，乃创藏文……”

《译师班智达遗教》(lo-pan-bkav-thang《五部遗教》之一)：“吐蕃通氏牦牛部落家族阿努之子，精通梵文，乃取梵文五十字母，并为三十，复迎请迦湿弥罗王子阿难陀，共同翻译《白莲经》等为藏文……”

在这两种伪书之后，有布顿·仁钦珠(Bu-ston-rin-chen-grub1290—1364)的《善逝佛教史》(1322年)加以宣传：“往昔，吐蕃并无文字，(于此赞普时)乃派遣通米阿努之子，偕同随行人员一十六人，往天竺习学文字。先从大班智达天种狮子习声明之学，参据蕃语实际，乃创三十字母及四元音，字体乃仿迦湿弥罗文字也……”萨迦派金刚教持索南坚参(Bsod-nams-rgyal-mtshan)所著的史部名作《西藏王统世系明鉴》(1388年)对于传播这一传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吐蕃无文字，乃派遣通米阿努之子，名通米桑布札者，心性渊懿，根器锐利，具足无量才能，使携多量黄金，前往天竺，习学文字……以那伽惹及伽塔等部类繁多，为使在蕃土不致变易，创立依兰查天字，瓦尔都龙字，制定天然完美之西藏文字……”。

以上四种文献可以作为宣传这一说法的代表作，但它们之间也有歧异，比方：藏文究竟是仿照哪一种字母，也是说法不一。

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篇”第八节里就透露出这一消息：“往昔，吐蕃无有文字，乃于此赞普(指松赞干布——笔者)时创出……”基本上可以看作9世纪时对这一传说的采录。

在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内都立有通米桑布札塑象。西藏尼木县境内有通村，相传就是通米桑布札故家所在地。而贵族世家之一的“通巴”据称是通米桑布札的后裔。看来，历史上确有过通米桑布札其人，可能是他对于藏文规范化做过杰出的贡献。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氏于1976年《东洋学报》第57卷1、2号上独标新论，题为：“《三十颂》和《性入法》成书年代考——兼论通米桑布札在世年代。”文中对通米桑布札是否是藏文创制者以及生活的年代提出了怀疑。其说颇为新奇，引起人们注意。

②已经公布的文献如下：

金石铭刻有13件，其目录是：

唐蕃舅甥会盟碑	会盟	823年	存，完好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	纪功	764年(?)	存，完好
第穆萨摩崖刻石	颁赏	798—815之间	存，完好
谐拉康碑甲	述德	798—815之间	存
谐拉康碑乙	述德	812年	残
谐拉康刻石	祭祀	798—815之间	存
琼结赤德松赞墓碑	述德	816年	存，漫漶
噶迥寺建寺碑	封诰	802年	残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	封诰祭祀	779年	存，完好
粗布江钟建寺碑	祭祀盟誓	816年	存，完好
昌珠寺钟铭	祭祀	798年	毁
桑耶寺钟铭	祭祀	779年	存
叶尔巴寺钟铭	祭祀		毁

写本手卷藏于巴黎图书馆的部分在R·石泰安教授、布隆多教授主持下，有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帕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先生合作进行选编影印，已出版了两集，印制得十分精美，并有精辟的注记。此事受到国际藏学界的普遍欢迎，见山口瑞凤的书评。载《东洋学报》第61卷1、2号，1979年12月，他在文中说：“给目前的西藏研究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称赞“这是光辉灿烂的精美印刷品”。见《巴黎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选集》（以英国印度事务部及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藏文文献作补充者）（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ète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e offertes au British Museum）Tom I, 1978年，PP.

1—304。58个编号，I，1980年，PP、305—640，111个编号，Paris。据宣称，今后还将继续出版三卷，共为五卷本。可以说这是关于写本手卷的一件大事，是最集中地把文献公诸于众的一次。其价值超出任何以往零星公布资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竹木简牍的资料公布的有三个部分，即A·斯坦因所得藏于大英博物馆者，见于《西域》和《亚洲腹地》两书的影录。俄国马洛夫

所得者，藏于列宁格勒的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已公布于《东方学研究所学报》和《东方碑铭学》者6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发掘所得，已公布者，见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出土文物》（1976年）第70页影录。

③这一方面研究成果很多，今择其要者介绍于下：

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的《吐蕃赞普陵墓考》一书，出版于1950年，是介绍吐蕃金石的重要著作，全书108页，收录碑刻和钟铭8件。

英人瑞查逊（H. E. Richardson）著有《拉萨两通碑刻考》（1952年），《西藏三块石碑考》（1949年）《谐拉康藏文石刻》（1953年），《工布摩崖石刻》（1954年）等。他所录的碑文得到西藏学者多穷活佛的帮助。

法国藏学家巴高（J. Bacot）、杜散（Ch. Toussant）和英人托玛斯（F. W. Thomas）合作编译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笔者将此书译成汉文时更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年）。

英人托玛斯的《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1935—1963年）特别是其中第2卷基本上都是对于吐蕃时期文献的解读。■

李方桂《唐蕃会盟碑考》（1956年）、佐藤长《唐蕃会盟碑研究》（1949—1959年）、法国藏学家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帕尼安 Ariane Spanien）在《拉鲁纪念文录》中有一篇长文，题名：关于伯希和收藏的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藏文卷的解释。长达200页，把伯希和藏文写卷1038、1247两号跟1290、1286、1287等著名的吐蕃历史文书联系起来研究，有很多新的见解（此文已由耿升译为汉文即将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匈牙利藏学家乌瑞（G. URAY）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大，最近几年他的重要论文是：《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甘州和子阙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1981年）（这篇崭新的论文解读了18个藏文写卷，介绍这一批重要的藏文史料）、《释Khrom，吐蕃王国在7—9世纪时的一级政府单位》（1979年）、《斯坦因藏卷V. 169, fo 1184号，吐谷浑王子的史事考》（1978年）。

日裔法籍藏学家今枝由郎的《伯希和藏卷1291号战国策残卷藏文译文研究》（1980年）、《Chis一词的翻译问题》，后者探讨了《尚书》藏文译文残卷，即伯希和藏卷986号的问题。此外尚有张琨的《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1959—1960年）、藤枝晃《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1961年）、戴密微（P. Demieville）《拉萨僧诤记》（1952年）等都是研究这一时期藏文文献的重要著作。

④最引人注目的是伯希和藏卷1283号，这一份藏文卷子记述了北方若干民族和部落的原始资料，资料发表后有巴高（J. Bacot）（1956年）、克洛松（G. Cluson）（1957年）、聪果尔（B. Csogor）（1960年）、韩伯诗（L. Hambis）（1958年）、李盖提（L. Liget）（1971年）、森安孝夫（1977年）和我们的研究共七家。钢和泰卷子又是另一个例子。尤其是森安孝夫、安部健夫和李盖提等人从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角度来研究吐蕃史料，发表了诸多极有兴味的论文。如森安孝夫《回鹘吐蕃789—792年的北庭之战》（1981年）、《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283号新释》、埃塞迪（H. Ecsedy）《公元790—791年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1964年）、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957年）。目前，充分利用藏文史料来补足，并解决中亚史上的若干问题是一新的趋势，值得注意。详见本书第70简注②。

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

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

⑦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藏语专业自1978年起设立《吐蕃文献选读》、《吐蕃金石选讲》、《吐蕃简牍选讲》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研究》等课程，出版了专用教材，并招收了研究生。现在西藏青海等院校的藏语专业中也开始设置这一课程。

⑧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穆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古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197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本文中所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译注）1980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⑩这里《且末国》系采用了佐藤长氏的译法。

⑪《陈子昂集》

⑫《册府元龟》九九三，外臣部。

⑬《册府元龟》九九二，外臣部。

⑭《册府元龟》三六六，将帅部。

⑮中山大学历史系友人姜伯勤君撰有《突地考》一文，蒙他将未刊稿寄赠，这里所引，大都是姜君的观点，对他的盛情深表谢意。

⑯载《新疆出土文物》第70页影录，197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

图 版 目 录

- 1—10 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木简
- 11 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羊胛骨卜辞
- 12—14 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木简
- 15—16 选自 F·W·托玛斯《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第三集中的木简附片